

自由民族主義之一例——論《獨立評論》對中日關係問題的處理

陳儀深

摘要

台灣學界似有不少人對民族主義採負面評價，除了由於厭惡中國民族主義或懼怕台灣民族主義等政治因素以外，很可能由於對民族主義的刻板認知，以為它必然與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價值相牴觸。事實不然，自由主義的傳統價值與民族主義的傳統價值實有相涵容的空間，除了英國的彌爾（J.S.Mill）或義大利的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之類的自由民族主義先例以外，本文認為以胡適為代表的《獨立評論》同仁，在 1930 年代的中國亦表現出自由民族主義的思想特色，他們在九一八事變、偽滿成立以迄七七事變全面戰爭爆發之間，曾屢次呼籲國際聯盟介入調停以便和平解決中日問題，反對以榨錢、拉伕的野蠻手段驅使同胞對日作戰，主張在未失的疆土上面努力「抵抗」——以阻止日本在偽滿以外的中國領土上得寸進尺。

就像 Yael Tamir 所描述的自由民族主義特點，《獨立評論》的同仁似已儘量「把國族思考放在自由主義的界線內，而不偏廢其一端」，「不犧牲別的價值來終極地追求另一套價值」，「個人的反省、選擇，與國家的歷史、命運同樣重要」，換言之，《獨立評論》的同仁固然與徐炳昶、董時進的暴虎馮河不同，與發起學生運動進而策動罷課的激進份子不同，與動輒把「抗日」、「反蔣」綁在一起的地方勢力或共產黨不同，亦與遲不開放憲政而且

嚮往法西斯的政府中人不同，何以不同？乃因他們的民族主義立場受到自由主義的範限所致。

本文認為透過自由民族主義的理論概念，有助於釐清「胡適型」民族主義的特色，進而增加對民族主義的信心與揀別能力。

關鍵詞：自由民族主義、獨立評論、胡適、中日戰爭

An Instance of Liberal Nationalism—— On *Independent Critic's* Treatment of Issues i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Chen Yi-shen

Abstract

There are not a few people in Taiwan's academic circle who tend to adopt a negative attitude in the evaluation of nationalism, due partly to such political factors as their hatred of China's nationalism or their scare of Taiwan's nationalism; there are also other very probable reasons arising from a rigid perception of nationalism, taking it as necessarily to be in conflict with such values as freedom, human rights,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cy. The fact has been quite the contrary. Besides such precedents of liberal nationalism as shown either in the Englishman J.S. Mill or in the Italian Giuseppe Mazzini,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during the 1930s in China, and represented by Hu Shih, the fellow writers with *Independent Critic* did reveal characteristics of thought quite in line with liberal nationalism.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September-EIGHTEENTH Event of 1931 to the July-Seventh Incident of 1937 when the all-out war against Japan broke out, these writers were devoted to appealing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for mediation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a peaceful settlement of Sino-Japanese issues; they were also opposed to

resorting to barbarous means both for extracting money, and for forcefully enlisting people to serve the armed forces even for the sake of expelling Japa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ctually called for an all-out “resistance” in those territories not yet lost to Japan—as an attempt to halt Japan’s further encroachment onto China’s territories besides the already lost North-East China (Manchukuo).

Like the liberal nationalism as described by Yael Tamir, the fellow writers for *Independent Critic* seemed to have succeeded to a vary degree in placing national thinking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liberalism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either. They also renounced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just one value at the expense of the other. For them, reflection and choice are as important as history and fate. In other words, the fellow writers for *Independent Critic* were of cours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Hsü Bing-chang and Dong Shih-jin, who were just outrageous agitators against the Japanese; they also differed from radicals, who simply stirred up student movements and then instigated them to boycott classes; they were also not in the same category of people as the local powers or the Communists, both of whom constantly linked “repulsing Japan” with “anti-Chiang Kai-shek” without cause and discrimination; nor were they in the same boat with those in power in the Nanking government, who repeatedly put off the practice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while holding fast to the dream of fascism. What then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writers and them? For me, this ultimately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ir stand on nationalism is defined, delineated and informed by their liberalism.

This paper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ism of the Hu Shih type can be clarified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very concept of liberal nationalism, and this will further enhance our capacity for make distinctions and strengthen our faith in nationalism.

Key words: liberal nationalism, *Independent Critic*, Hu Shih,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自由民族主義之一例——論《獨立評論》對中日關係問題的處理

陳儀深*

請你注意我們提倡自責的人並非不愛國，也並非反民族主義者，我們只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者而已。我們正因為愛國太深，故決心為她作諍臣、作諍友，而不敢也不忍為她諱疾忌醫，作她的佞臣損友。（胡適，1935 年給陶希聖的信）

前 言

- 一、守望與追蹤—關於日本與國際的情勢
 - 二、如何調整中日關係？—胡適與室伏高信的對話，及其他
 - 三、喚醒與督責—塑造民族主義的努力
 - 四、抵抗—和戰問題的中庸路線
- 討論與結語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原發表於本所東亞研究群在 1999 年夏天舉行的小型會議，承研究群諸同仁批評指教，後經擴大改寫，加強「自由民族主義」方面的意義，再於所內討論會報告時，尤其受到組外同仁黃克武、沈松儒二位先生的批評指教，本文並已依集刊審查流程的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作了修改，惟限於時間與學力，恐難一一符合上述諸先生的理想期待，謹致謝意與歉意。

前 言

1998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日本，和日本首相小淵惠三舉行高峰會議，會後欲發表的聯合宣言幾乎難產，原因之一是中國方面對於有關歷史問題的描述未列入「侵略」、「道歉」的措詞，最後雖然有「侵略」、「反省」的字眼，但有關道歉則僅以口頭表明；日本《產經新聞》報導，日本人民已對中共不停要求日本就戰爭道歉一事感到厭煩，問道「我們要一再道歉到什麼時候？」¹

1937迄1945年的中日戰爭誠使中國創鉅痛深，論其影響還有值得不斷研究的餘地，道歉與否、如何道歉其實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若把全面戰爭的起源溯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那麼1931-37這幾年的中日關係如何？是否可能避免戰爭？中國政府對日本步步進逼的肆應是否得當？當時處在「國難時期」的知識份子，是否充分發揮對政府督責、協助，對民間守望、引導的角色？筆者曾經撰寫《「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一書，²對於胡適（1891-1962）、蔣廷黻（1895-1965）、丁文江（1887-1936）、蕭公權（1897-1981）、陳之邁（1908-1978）、張佛泉（1908-）、張熙若（1889-1973）等等知識份子的民主思想作了綜合分析，認為他們對民主政治的理解穩健切實、同時承載了傳統自由主義的若干優缺點，³並沒有如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言「曾有數以千計的知識份子評估政治急進得不管實際上的困難」那種誇張的現象。⁴由於這群知識份子身處北方危城，對於國難有貼切的感受，透過他們在《獨立評論》所撰有關中日關係的文字，在相當程度有助於回答上述的問題。進一步說，儘管自由主義者關切的重點在於憲政制度和公民權利，但是逢到外敵侵略的時候，很可能都變成民族主義者，即一方

¹ 新聞報導詳見1998年11月27日中國時報第2頁，11月28日中國時報第14頁。

² 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本書連同附錄計387頁。

³ 同上註，頁262-273。

⁴ 墨子刻，〈再論政治批評的風格——答張忠棟、康勤、廖仁義諸先生〉，中國時報副刊（1983年5月20-23日）。

而不放棄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信念，一方面關切如何增強國力、如何抵禦外侮。這種思想現象，可否逕稱為「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

若以近年來的台灣為例，一方面由於民主化使得「命運共同體」意識逐漸成型，一方面中國北京政府意圖兼併台灣的急切言行更加強此一趨勢，因而關於台灣民族主義的討論不但不是媒體的禁忌，而且已成為博碩士論文的主題。新興的民族主義的存在及其研究既不成問題，只是不同類型的民族主義會有不同的後果，有人擔心偏狹的、排他的族群民族主義會給台灣帶來災難，即使是自由民族主義，當危機來臨時也會迅速轉成族群民族主義，⁵有人則小心翼翼地探索「自由主義作為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基礎」的可能性，⁶而比較全面地探討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諸問題的專書《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其討論自由民族主義的部份主要係依據 Yael Tamir 的說法，認為自由民族主義肯定了自由主義最核心的「個人擁有反省批判選擇權利」的信條，放棄了傳統民族主義所在意的「政治自主或獨立」的理想，因而它不太像一般所理解的民族主義，反而類似多元文化主義，換言之，「它是民族主義的再生，也是民族主義的終結。」⁷個人對於 Yael Tamir 的理解則並非如此，儘管自由主義傳統（如尊重個人自主、反省與選擇）與民族主義傳統（強調歸屬、忠誠和團結）常被視為互斥，Yael Tamir 却認為這兩套價值可以互相容納（accommodate one another），她說：民族主義者強調個殊環境的重要以建構個人認同，並不與人性的普遍觀點相抵觸；個別的人天生是人類社群的成員，在此社群之外他們無法發展其語言、文化，或設定其目標，他們的生活變得無意義，沒有價值規範可供選擇，從而無法變成自由主義者所想定的自由自主的人。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是理性與感性之間的拔河，並沒有簡單的方式可以排列這兩套價值，無論如何，「反省、

⁵ 趙剛，〈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1 期（1996 年 1 月），頁 1-72。

⁶ 吳乃德，〈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1996 年 7 月），頁 5-39。

⁷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公司，1998 年），頁 207。

選擇」與「歷史、命運」同樣重要，Yael Tamir 認為規避（bypass）民族主義的概念是錯誤的，她希望讀者評判她是否成功地「把國族思考放在自由主義的界線內，而不偏廢其中一端」，她還說：「所有的適當答案都需要相當程度的容忍、開放心靈與普通常識，捨此，無論如何界定完善的理論也沒有用處。」⁸筆者因而以為，把「自由」「民族主義」合為一詞，已顯示其調和妥協、不使偏廢的企圖，似不必另擬一個簡單的定義。

英國政治思想家彌爾（J.S.Mill）或義大利愛國者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都被認為是自由民族主義的代表者，而荷蘭讓比利時獨立、丹麥讓挪威獨立，或大英帝國的英語區也逐漸變成獨立的自治領政府的自由組合，更是自由民族主義「正確性」的明證。⁹那麼，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中國，是否存在怎樣的自由民族主義？

歷史學的研究或許能補充政治理論的不足。本文嘗試以《獨立評論》作為分析對象，即是想從具體時空下發生的事例，來查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民族主義言行，探討自由民族主義存在的特點，及其面臨的問題。

《獨立評論》週刊在 1932 年 5 月 22 日創刊，距離上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才八個月，距離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才兩個多月，所以胡適說這份刊物「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裏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說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¹⁰迄 1937 年 7 月 25 日因戰火而停刊為止，計出刊 244 期。筆者在前揭拙著中嘗為作內容分析，撰文十篇以上的作者有 23 位，各類文章之中，談論「中日關係與挽救國難」、「日本情勢」、「國際聯盟」三者合計達 205 篇，約佔全部文章 1317 篇的 16%。

《獨立評論》雖然自我期許成為「全國用公心討論政治社會問題的人

⁸ Yael Tamir,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11.

⁹ Frederick Watkins 著，李豐斌譯，《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 年），頁 207-215。

¹⁰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年），頁 136。

的公共刊物」，事實上外稿的數量也比社員的稿稍多，¹¹但它畢竟是個同人雜誌，撰稿數量排名第一的胡適寫了 123 篇，第二名丁文江 69 篇，第三名蔣廷黻 56 篇，第八名傅斯年（1896-1949）40 篇，這幾位社員可以說是這份刊物中討論中日問題的「主流派」，至於第十八名的張忠紱（1901-1977）（13 篇）、第十九名的徐炳昶（1888-1976）（12 篇）、第二十二名的董時進（11 篇）雖然也是積極的撰稿者，¹²但他們對國際聯盟的負面態度或強硬主戰的立場，都明顯受到前述社員的文章予以辯駁（後詳），換言之，《獨立評論》是有立場的，稍微用心的讀者都不難探知《獨立評論》的立場。

一、守望與追蹤——關於日本與國際的情勢

《獨立評論》創刊的七天前，日本首相犬養毅（1855-1932）在他的官邸被刺殺了，翌日內閣向天皇總辭以後，經過一週之久才確定由齋藤實（1858-1936）出面組閣，丁文江認為這種延宕「是日本政治史上從來所沒有的」，組閣的困難不是因為多數黨政友會沒有首領，而是被推舉的鈴木遭到陸軍方面極力反對，政黨與軍人僵持不下，遂由西園寺元老出來調停，結果才以齋藤實組閣，號稱「協力內閣」，乃是不完全否認政黨，又不令一黨擁有政權；根據丁文江的分析，犬養毅很可能就是因為公開演說維護議會政治才引來殺身之禍，總之日本軍人公然以恐怖手段威嚇政黨，日後的政治必難期安定。¹³

丁文江對日本的財政也做了功課，他根據各種數據發現歐戰以後的日本不斷發生財政赤字、貿易入超、以及物價上漲的壓力，不過「距崩潰的程度還遠」。¹⁴最引人注目的，是中日兩國物質力量的對比：中國號稱養兵兩百萬、日本的常備兵不過二十萬，但是中國軍隊的步槍不足、口徑不一，全

¹¹ 胡適，〈又大一歲了〉，《獨立評論》第 151 號（1935 年 5 月 19 日），頁 2-4。

¹² 以上的文章篇數排名詳見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頁 12。

¹³ 丁文江〈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的前途〉、〈日本的新內閣〉，分見《獨立評論》第 1 號（1932 年 5 月 22 日），頁 3-5；第 2 號（1932 年 5 月 29 日），頁 2-3。

¹⁴ 丁文江，〈日本的財政〉，同上註第 2 號，頁 8-15。

國所有的機關槍大概不過幾千桿（歐戰時每師只有 1500 桿），75 公厘的野砲大概一萬人分不到兩尊（實需 24 尊），重砲、坦克、毒氣和飛機幾乎沒有，所以就武器而論，中國的兩百萬兵，抵不上日本的十萬。所以丁文江不贊成「對日宣戰」，因那等於自殺。¹⁵

其次，蔣廷黻認為中國有關外交的輿論不健全的原因，主要是大學教育偏重英美法德而忽略日俄，甚至歷史系很少開設日本史及俄國史，真是一個「不可原宥的罪惡」。¹⁶他自己曾根據一位俄國學者所撰英文書的附錄，提出 1907 年 7 月 17 日的日俄密約與同日簽訂的公開條約內容相反：公約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密約則開始中國東北的瓜分。¹⁷他呼籲重視日本史、俄國史，因為一國的歷史就是一國的履歷，「我們平素交友及辦事都知道第一步是打探對方的履歷，在國際關係上也是如此。」¹⁸

1933 年是國際關係史上的重要分水嶺，這一年內：國聯處置中日問題失敗、裁軍會議失敗、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也即告失敗，蔣廷黻認為這是國際主義的破產，偏狹的、軍備競爭的國家主義的勝利；至於未來，要看日本採取的是攻勢或守勢的外交：如果日本是為東北本身而佔領東北，那麼它既已得了東北就會滿足，但是如果日本自己要給東北問題更大的「世界性」，那麼世界大戰必會在短期內爆發。蔣廷黻根據不久前廣田外相在日本國會的演說詞——對於中國共黨的發展日本保留干涉的權利，遂認為日本是要藉東北來控制全中國，這是攻勢的外交。¹⁹蔣廷黻的觀察，從幾年後七七事變、珍珠港事變引起的全面戰爭，可以得到驗證。

¹⁵ 丁文江，〈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獨立評論》第 37 號（1933 年 2 月 12 日），頁 2-8。文中亦檢討上一年抵制日貨的成績不佳，因為扣除東三省之後對日入超依然達 5500 萬元；他同時提醒，不論怎樣努力抵制日貨，雖可以使日本蒙受損失、卻無法制其死命，因為中國本部的對日貿易還不及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 10%。

¹⁶ 蔣廷黻，〈外交與輿論〉，《獨立評論》第 70 號（1933 年 10 月 1 日），頁 4-7。

¹⁷ 蔣廷黻，〈東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約〉，《獨立評論》第 8 號（1932 年 7 月 10 日），頁 17-20。

¹⁸ 同註 16。

¹⁹ 蔣廷黻，〈國際現勢的分析〉，《獨立評論》第 88 號（1934 年 2 月 4 日），頁 5-9。

除了大趨勢的研判，《獨立評論》也刊登一些細節的相關資料，例如〈冒險過偽國記〉敘述作者搭火車前往俄國，取道大連、瀋陽、長春等城市的見聞；²⁰〈「滿洲國」視察記〉是英國籍記者所寫，敘述偽滿的幣制改良、土匪活動、外商投資的情形；²¹〈一個日本的人才統計〉則報導著日本各國立大學畢業生的人數及專長分佈、公私立機關的用人情形。²²

不過，收集日本的相關資料雖然重要，傅斯年則提醒有知識而「但偏一隅」更容易誤事，他希望自詡「懂得日本情形」的人也要自問：知道歐美的情形嗎？合一切的情形而權衡輕重，能看到一個將來在眼前嗎？傅斯年承認日本擁有巨大的、非中國所能及的陸海空軍，但是為何不即來併吞中國？為何要耐著性子「走一條弧形的兼併之路」？傅斯年認為國際關係使日本有所顧忌。²³這就是包括胡適、蔣廷黻、傅斯年在內何以不斷對國際聯盟寄以厚望，甚至當國聯處理中日問題失敗之後，1935-1936年處理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事件，國聯對義大利的制裁「完全不會發生效力」時，張忠紱宣告「國聯的沒落」，²⁴胡適卻依然樂觀寫著〈國聯還可以抬頭〉。²⁵由此可見，自由主義在一般情況下與國際主義的親近性。事實上早在1922年胡適即曾在《努力》週報寫過〈國際的中國〉一文，批評共產黨人把中國落後的問題歸咎於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胡適認為真正的原因是中國自己的政治不上軌

²⁰ 陳運煌，〈冒險過偽國記〉，《獨立評論》第84號（1934年1月7日），頁16-18。

²¹ 田伯烈(H.J. Timperley)，〈「滿洲國」視察記〉，《獨立評論》第121號（1934年10月7日），頁9-14。

²² 君達，〈一個日本的人才統計〉，《獨立評論》第73號（1933年10月22日），頁4-7。

²³ 孟真，〈「不懂得日本的情形」！？〉，《獨立評論》第88號（1934年2月4日），頁2-5。

²⁴ 張忠紱，〈國聯的沒落〉，《獨立評論》第201號（1936年5月17日），頁21-25。

²⁵ 蔣廷黻寫過一篇〈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與國際〉，發表在《獨立評論》第45號（1933年4月9日），頁2-5。文中認為國聯不但是聯合世界一致對日的好工具，而且是幫助中國實行現代化的一個好機關，中國應力圖歐美資本及技術的合作。胡適寫的〈國聯還可以抬頭〉，發表於《獨立評論》第202號（1936年5月24日），頁2-5；乃引起羅隆基的批評，〈「國聯還可以抬頭」？〉，《獨立評論》第204號（1936年6月7日），頁17-20，文中指胡適所談的是個人的政治理想，不是世界的實際政治。

道，把責任推給帝國主義是無根據的，「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²⁶

後來蔣廷黻把這個立場作了更直截的發揮：

國與國之間競求自己政治、經濟、文化勢力的膨脹，乃是一種天然現象，無所謂善惡，如果要談善惡和責任，那麼強者和弱者是同等地須要負責，如果不求自己的「膨脹」，而徒怨天尤人，咒罵帝國主義，這是自暴自棄，更加招人的鄙視和壓迫。²⁷

如此理性反省、返求諸己原是自由主義者的態度，但要說二〇、三〇年代的英美法德俄都沒有「用政治力侵略別國」（孫中山對帝國主義的界定）的跡象，恐亦不符事實。不過由於三〇年代日本對中國的壓迫顯而易見，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胡、蔣諸人依著過去的思維習慣寄望於國際聯盟，實屬自然之事。

二、如何調整中日關係？——胡適與室伏高信的對話，及其他

1935年2月27日，汪精衛（1883-1944）、蔣介石（1887-1975）聯名向全國各機關團體發佈嚴禁排日運動命令，是日國民黨中政會亦通告各報紙、通訊社禁止刊載排日運動和抵制日貨的消息；翌日，日本外務省決定對華根本方針是：「根絕排日為中日經濟提攜之先決條件，中國政府應有禁止排日排貨之具體事實。」²⁸隨後的三月初，傅斯年即撰文對兩個月來流行的「中日親善」論調批評為「真是歷史上的最慘酷的幽默」，因為九一八以來日本對世界的發言莫不以東亞主人自居，要求其在東亞有特殊地位、對中國有特殊威權，這時候中國的領導人（指的是在中政會演說的汪精衛）怎可以無端地讚揚中日之間的特別親密關係？傅斯年認為偏親一個強鄰會有「望風

²⁶ 詳見張忠棟，〈胡適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收入《政治批評與知識份子》（台北：自立晚報社，1985年），頁171-220。

²⁷ 蔣廷黻，〈帝國主義與常識〉，《獨立評論》第71號（1933年10月8日），頁7-11。

²⁸ 李松林等編，《中國國民黨大事記（1894.11～1986.12）》（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246。

歸順之弊」，除非日本人改變其對東北之態度，否則中日親善絕不可能。²⁹

這一層意思，在胡適與室伏高信（1892-1970）的對話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清楚。

來自東京《日本評論》月刊的室伏高信，在1935年夏天以〈告於日本國民〉的題目向胡適約稿，三個月後胡適終於交稿，他的文章主要是三句話：（一）懇求日本國民不要再談「中日親善」這四個字了，（二）請日本國民不要輕視一個四億人口的民族的仇恨心理，（三）日本國民不可不珍愛自己國家過去的偉大成績和未來的偉大前途。其間他感慨日本過去維新以來60年的光榮歷史，尤其民主憲政的趨向在短期中被截斷了，日本已變成武人專政、紀律崩壞、有敵無友的恐怖國家，他警告無限制的擴充軍備會增加國際上的疑忌，甚至可能引起國際的大戰禍，最後他希望日本能懸崖勒馬、回頭是岸。³⁰

上述的文章稍被刪削之後刊登在11月號的《日本評論》，胡適對該刊「諸位編輯先生的雅量」表示敬佩，而室伏高信就在12月號發表〈答胡適之書〉。室伏高信首先表示胡適的那篇文章已引起日本知識階級「很大的感動」、對胡適「異常的稱讚」、對中國「發生莫大的同情」，室伏高信強調「我們到底是東方人」，日本國民亦深受孔孟老莊遺產的影響，只是現在又受到物質主義、猶太主義、德國軍國主義、英國帝國主義的（不良）影響，室伏高信承認日本（對華政策）是有過錯，但是關於仇恨心理的問題，他質問「貴國的指導者，曾否努力勸導過國民，使與日本發生真正的友情？還是在努力使中日關係成為絕望的惡化？」此外，「貴國用以夷制夷政策而與日本對立，這是世界周知的事實」。最後，室伏高信發出警告：「不要受不列顛的誘惑」，「中國的敵人，是日本還是英國？應該是日本，還是應該是英國？」³¹當時的《大公報》把室伏高信的文章譯載，胡適再把它登在《獨立評論》上面，同時並列自己的一篇〈答室伏高信先生〉。胡適對於室伏高信

²⁹ 孟真，〈「中日親善」？！〉，《獨立評論》第140號（1935年3月3日），頁2-4。

³⁰ 胡適，〈敬告日本國民〉，《獨立評論》第178號（1935年11月24日），頁10-14。

³¹ 室伏高信，〈答胡適之書〉，《獨立評論》第180號（1935年12月8日），頁8-12。

把中國人的仇恨心理看作「以夷制夷」政策的結果，還提出「中國的敵人是日本還是英國」這種問題頗感驚訝，他解釋以夷制夷只不過是「借一個友誼的國家的援助來抵禦一個敵對的國家」，這是一切國家（包括日本）常做的事，它只有成敗可以評量，沒什麼是非可以判斷；關於「不列顛的誘惑」，胡適舉出 1927 年 1 月初中國的革命黨人用武力佔據漢口英租界的往事，當時英國外交家甚為忍耐，不但沒有拔出刀來，並且派遣專員到武漢去和陳友仁訂立漢口協定，不久以後「風頭轉了、仇英的心理漸漸轉過了」，所以胡適也搬出古人的話：「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如果日本一旦改塗易轍變成中國的好朋友，中國人當然可以忘記過去的許多怨恨。³²

第二年春天，由於日本的廣田外相首先喊出「調整中日關係」，這句話又成為報紙上的時髦用語。旋即成為首相的廣田，有以「廣田三原則」作為調整中日關係之先決條件的意思，所謂三原則是（一）徹底取締排日言論，並放棄倚賴歐美政策，採取親日政策；（二）中國對於「滿洲國」事實的存在必須加以尊重；（三）中國北邊一帶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須共商有效辦法。對此，胡適繼續撰文明告日本政府與國民：廣田三原則是增加中日仇恨的條件，不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胡適另外提出廢止塘沽協定、宣告「何梅協定」無效、禁止華北各省以及福建境內一切運動偽自治的活動等等七點作為調整關係的「先決條件」，他明知日本方面做不到這些，最後只好說：「如果日本的政府軍部到今日還夢想中日關係的調整只是中國單方面的屈服，那麼，我們深信我們兩國間的關係是無法調整的，只有大家準備扮演同文同種相屠殺的慘劇而已。」³³胡適是不幸而言中了。

1936 年 7 月，胡適乘船赴美國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大會，取道日本的時候在東京又見到室伏高信，談話中室伏問起中國的學生運動，謂「日本的報紙都說你（胡適）是指導的人」，胡適不置可否地答「老人們說我太激烈，青年們說我太保守」。胡適似乎有意對這位日本友人傳達某些訊息，他

³² 胡適，〈答室伏高信先生〉，《獨立評論》第 180 號（1935 年 12 月 8 日），頁 5-8。

³³ 胡適，〈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獨立評論》第 197 號（1936 年 4 月 19 日），頁 3-5。

在回答室伏的問題中一方面承認自己是個自由主義者，一方面又說最近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獲得壓倒性的勢力，國家這個東西成了第一線。於是室伏高信就善意地以去（1935）年夏天遊歷北平之際，感受到胡適反對獨裁主張民治的印象，對照現在胡適「無論什麼，沒有比統一再要緊的」立場，感慨說「由外部所加的分裂政策，只有造成民族統一的反（對）效果。」³⁴胡適堅持民治反對獨裁的立場其實一直沒有改變，只是室伏高信可能不知：胡適主張結束訓政開放憲政，並不妨礙他的民族主義立場。³⁵

三、喚醒與督責——塑造民族主義的努力

如前所述，單憑中國之力難以抵抗日本，於是尋求國際的奧援——那怕如國聯的報告書、決議文那樣的道義支持——乃是合理的出路，而日本方面了然於此，一再要求中國不可「以夷制夷」。中國政府在壓力之下一度傳出「外交方針醞釀轉變」的消息，但是正當中國軍事失利、日本佔據東北的時候，對日妥協等於對日屈服，所以蕭公權指出「純然東向的外交是不可能的，我們希望政府中人不至於冒昧地作這樣危險的轉變方針。」他的建議是繼續向國聯和國際求可能的援助，對日本則是求必要的諒解。蕭公權進一步認為：現在切身的問題是如何使中國具有立國最低限度所必需的條件——包括整頓政治、充實軍備、豐裕民生等，換言之，「我們建國的事業更切於復仇的事業」——可以暫時忘記東北、不可片刻停止建設。³⁶

胡適或許頗有同感，兩個半月以後就寫了〈建國問題引論〉，他一方面為「現代化」找界說，一方面感慨中國「國家還不成個國家、政府還不成

³⁴ 室伏高信這一篇〈胡適再見記〉，登載於7月23日東京《讀賣新聞》的文藝版。收入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四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頁1533-1537。

³⁵ 胡適認為民選國會有助於政治統一，可以收拾全國的人心。詳見陳儀深，前揭書，第三章。

³⁶ 君衡，〈中央外交方針如何轉變？〉，《獨立評論》第66號（1933年9月3日），頁2-4。

個政府」，兩年來的國難應可提醒一般人「當前的大問題依舊是建立國家的問題」。³⁷雖然這個「引論」意外引起蔣廷黻、丁文江和胡適之間的「民主與獨裁」論戰，不是本文討論的範圍，但是這個 nation-building 的方向，的確是抗日問題的根本。

廣義而言，民族主義是一民族（潛在的或實際存在的）成員的覺醒，這種覺醒是與實現、維持與延續該民族的認同、整合、繁榮與權力的慾求結合在一起。依照篤意奇(Karl W. Deutsch)的說法，民族的產生主要是隨社會動員(social mobilization)而發生的，所謂社會動員是指促使孤立的鄉鎮人民超越地方與偏狹的利益，因而形成政治社會的一連串變遷、動力與壓力。³⁸

社會動員的過程，當然離不開語言文字、傳播媒體，其間知識份子扮演重要角色。三〇年代儘管國難當前，許多民衆還是渾然不覺，例如傅斯年所描述的北平社會：

一個個的根本沒有辦法徒耗國家錢財的大學設著，一排排的開紮綵舖主義的學術機關放著，一戶戶的與掘墳的土匪外國的奸商合作的古董舖子開著，一隊隊的醉生夢死的人們在享樂著，無限的窮苦人在大雜院中坐地待死著。試看自北海公園到先農壇，那裏有國難的氣味？走遍五城的大街小巷，那裏有憂國的聲息？

傅斯年認定中日問題決無和平解決之望，日本人圖謀熱河、擾亂平津是必然的，從而「為中華民國的整個前途計，北平的存毀是不值半秒鐘猶疑的」！他提醒北方居民要有長久抵抗的準備，至於北方的軍人，若敢不抵抗而放棄江山，那麼「在中國、在外國、在租界」他們都將沒有立足之地，傅斯年還不厭其煩地解釋為何沒有立足之地。³⁹這樣的督責，不可謂不嚴厲了。

雖然丁文江預先警告日本的目的不在平津而在熱河，「所以我們真正

³⁷ 胡適，〈建國問題引論〉，《獨立評論》第 77 號（1933 年 11 月 19 日），頁 2-7。

³⁸ Reo M. Christenson et al, *Ideologies and Modern Politics*, 3r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1), p.22.

³⁹ 傅斯年，〈日寇與熱河平津〉，《獨立評論》第 13 號（1932 年 8 月 14 日），頁 7-10。

的防禦、長期的戰爭，也不在平津而在熱河」，⁴⁰但是 1933 年 3 月 5 日熱河全省就陷落了，十幾萬的守軍禁不起 128 個日本兵的進逼（衝入承德），就演出沒有抵抗的總潰退，胡適批評說：「一年零五個月的整理與補充還不能抵抗，熱河的絕好的天險地利還不能抵抗，可以證明這種腐敗軍隊遇著現代式的敵軍勢必如枯葉之遇勁風，朽木之遇利斧，無有不崩潰之理。」胡適認為除了熱河省主席湯玉麟（1871-1935）（不但無力作戰還搜括民脂民膏）要負責，張學良也要負絕大責任，因為他是 1929 年以來肩負華北軍政大權的人，東北淪陷之後他若早日辭職，還可以給中央多些時間佈署，「不幸他受了他的部下的包圍，變更了去職的決心，又不能振作起精神來積極準備。」此外，中央的責任則是沒有責成蔣中正北上坐鎮指揮，還容許他逗留在長江流域作剿匪的工作，輕重失宜，誤國不淺。⁴¹

以上的文章是在 3 月 6 日晚上寫畢，3 月 8 日即有「國民政府通緝湯玉麟令」，3 月 10 日又有「張學良辭職通電」。⁴²

然而熱河陷落以後，也傳出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從 3 月到 5 月，中國軍隊在長城一帶抗日作戰，如宋哲元（1885-1940）部在喜峰口的苦戰，徐庭瑤、關麟徵、黃杰所率中央軍在南天門一帶十餘日的血戰；尤其是 5 月 23 日，傅作義領導的一千多人的部隊在懷柔縣附近從早晨四時戰到下午七時，因停戰協定已成定局故而撤退，事後找到 203 具官兵遺骸運回綏遠，公葬在城北大青山下，胡適特地為這個懷柔戰役寫了一篇紀念碑文。⁴³

由於日本並沒有明目張膽併吞華北的理由，遂積極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但是除了逼迫宋哲元秦德純（1893-1963）等人表態，並不容易製造什麼民意支持。胡適就直截了當地說：「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完全與華北人民無干。」他還勸華北當局諸公不可忘了自己的責任，正當全國的領袖共同謀求國家的統一與團結的時候，「決不能容許任何區域在此時機脫

⁴⁰ 丁文江，〈假如我是張學良〉，《獨立評論》第 13 號（1932 年 8 月 14 日），頁 5-6。

⁴¹ 胡適，〈全國震驚以後〉，《獨立評論》第 41 號（1933 年 3 月 12 日），頁 2-8。

⁴² 李雲漢編，《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台北：正中書局，1982 年），頁 32-34。

⁴³ 胡適，〈中華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第五十九軍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同上註，頁 244-246。

離中央而變成受外人卵翼的獨立區域。」⁴⁴

當 1928 年國民黨統一中國以後，南京中央政府的官吏之中南方人比以前為多，頗引起一些北方人的抱怨乃至疏離，傅斯年擔心在國難時期這種南北矛盾的心理會有不良作用，特撰文為南京政府說話：「比起我們所見進步的近代文物昌明國家來，我們的政府很不好；若是比起北洋時代的北京政府來，至少高明十倍！……那時候率土分崩，現在立著一個有威權的中央政府。」⁴⁵在國難氛圍中，傅斯年進一步對「中華民族」作了詮釋：

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也有憑據在這個民族上的少數民族，但我們中華民族自古有一種美德，便是無歧視小民族的偏見，而有四海一家的風度。……未統一時，夢想一統；既一統時，慶幸一統；一統受迫害時，便表示無限的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復如此。居心不如此者，便是社會上的搗亂分子，視之為敗類，名之曰寇賊，有力則正之以死刑，無力則加以消極抵抗。⁴⁶

所謂中華民族若包括西藏、新疆、蒙古的人民，則「說一種話、寫一種字」顯然不是事實，傅斯年的這段描述顯帶著建構性（constructive）的意涵；至於居心若不朝向「一統」便會被視為敗類寇賊云云，應是傅斯年對某種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認知和描述，不一定是他的應然主張，否則就與本文所謂「自由的」民族主義有所差距。好在本文並不認為《獨立評論》的同仁都是「一個模子」般的自由民族主義者，即便是同一類型的民族主義，內部也可能有光譜般的差異。總之，在國難時期對一些離心力量的譴責、予以道德壓力，也是常見的民族主義動員方式，中日戰爭給中國的最大收穫，也許不是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是戰爭使得不分黨派、不分宗教、不分地域、不分種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個利害與共、休戚相關的「中華民族」。⁴⁷

⁴⁴ 胡適，〈華北問題〉，《獨立評論》第 179 號（1935 年 11 月 8 日），頁 2-3。

⁴⁵ 傅斯年，〈北方人民與國難〉，《獨立評論》第 181 號（1935 年 12 月 15 日），頁 2-5。

⁴⁶ 傅斯年，〈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同上註，頁 5-8。

⁴⁷ 關於中日戰爭對中華民族主義的影響，可參見拙著，〈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民族主義的

四、抵抗——和戰問題的中庸路線

抵抗二字，頗能表現「自由民族主義」的一種特性，它既不是怯懦放水，也不是不顧現實地宣戰。抵抗雖然免不了武力和作戰，但畢竟是被動的、矯正的意涵，與和平主義不相違背。

針對國內輿論喧騰的和戰問題，翁文灝（1889-1971）（《獨立評論》社員之一，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企圖指出一條中庸的路：絕對的戰——武力戰爭收回失地，或絕對的和——簽字承認屈服，這兩條路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們還有別的路麼？」他認為有，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敵人打到我們的領土，我們不論勝敗，終要拼命抵抗，愈多守一地愈好，愈多守一天愈好。淞滬的戰事，長城的戰事，我們奮勇抗敵的將士決不是白犧牲的，他們的犧牲已引起世界的同情而值得全國國民的感激。即使終於敗退，但是他們的壯烈的抵抗對於國事前途及外交形勢已有了極大的益處。……我們即使明知軍器不足訓練不足，但終也不肯將我們的疆土輕輕的白丟，即使失敗也要使敵人出相當的代價，費相當的時間。……我們的出路很明顯的是在利用國際地位的優勢，嚴整國內的組織，促成對日問題的一個解決，至少一個暫時的段落。⁴⁸

《獨立評論》的同仁對於「抵抗」的說法甚為一致，傅斯年就是一方面肯定國際聯盟之敢於指摘日本的暴行，一方面要求當政者準備抵抗，「不抵抗沒有結果，小抵抗有小結果，大抵抗有大結果。」⁴⁹丁文江也說：「我們唯一的生路是盡我們力量來抵抗」，「我們要生存，還得要靠國際的均勢。但是要人幫忙，先要自己幫自己忙。」丁文江還有一段極具代表性的話：

我個人向來極端唱「低調」的：我向來主張中國遇有機會，應該在

⁴⁸ 發展》，收入《「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6月），頁37-65。

⁴⁹ 詠霓，〈我們還有別的路麼〉，《獨立評論》第47號（1933年4月23日），頁2-5。

⁴⁹ 孟真，〈國聯態度轉變之推測〉，《獨立評論》第39號（1933年2月26日），頁7-11。

不喪失領土主權範圍之內與日本妥協。並且應該利用一切國際的關係，來和緩我們的危急，來牽制日本使它與我們有妥協的可能。⁵⁰這裏所謂「不喪失領土主權範圍之內」應指不能承認偽滿洲國。但又無法侈言武力收復，只能在尚未喪失的疆土上積極抵抗，使日本不致在偽滿之外假藉理由得寸進尺。所以蔣廷黻明說「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⁵¹

相對於《獨立評論》同仁的低調，當時確有一些「堅決主戰」的高調，例如徐炳昶就要求《獨立評論》的同仁聯合起來出個宣言「主張堅決的戰爭」，以造成全國一致的輿論，使政府無所躲閃。⁵²董時進也在《大公報》上說「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拚」、「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一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俠。」胡適引述這些話之後說：「我讀了這種議論，真很生氣。」「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麼？」胡適認為這些不負責任的高調都是廢話，他教訓他們作政論的人要有「無所苟」的態度，也就是處處存著哀矜敬慎的態度，在立說之前應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結果。⁵³

此外，1934年8月以迄1935年12月，日本關東軍推動執行的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即（一）要求國民黨與中央軍隊撤出，使華北政權流入真空；（二）選擇傀儡對象，使自治實權入於日軍之手；（三）壓迫南京政府，使其不得不承認日本在華北五省（冀魯察晉綏）的指導地位。⁵⁴北平各大學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徐誦明、陸志韋及教授傅斯年、胡適、任鴻雋、顧毓琇、張熙若、蔣廷黻等二十餘人就在「連日數次聚談」之後發表宣言：「堅決反對一切脫離中央和組織特殊政治機構的陰謀的舉動，我們要求政府用全國力

⁵⁰ 丁文江，〈假如我是蔣介石〉，《獨立評論》第35號（1933年1月15日），頁2-6。

⁵¹ 蔣廷黻，〈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獨立評論》第47號（1933年4月23日），頁5-8。

⁵² 徐炳昶，〈西安通信〉，《獨立評論》第46號（1933年4月16日），頁18-19。

⁵³ 胡適，〈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同上註，頁2-5。

⁵⁴ 關於華北自治運動的因果始末，詳見梁敬鋒，《日本侵略華北史述》（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103-136。

量，維持國家的領土及行政的完整。」⁵⁵接著，更發生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學生示威遊行，陸續有學生被捕，風潮擴至全國 35 個城市，各地大中學生遊行達 65 次，抗日情緒之鼓盪最為普遍。日本軍人對此次學運大率歸咎於共產黨（實則此次學運「以後」才較有共產黨的介入經營），但高橋武官卻向宋哲元指控胡適、蔣夢麟「操縱學潮」，要求他們離開北平。⁵⁶

胡適確曾在一二九之後發表〈為學生運動進一言〉的文章，他說：在外患嚴重、漢奸遍地的時候，國家最需要的是不畏強禦的輿論和不顧利害的民氣；我們這個國家社會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順民，而是有力量的諍臣義士。在這個立場上，胡適稱讚學生們的反對「自治」大遊行是空谷足音、是壯舉。但是對於隨後發生的罷課則不以為然，他認為罷課是「最無益的舉動」，學生運動只能有一個目標就是監督或糾正政府的措施，青年學生的基本責任到底還是在努力發展自己的知識與能力。⁵⁷其實，12 月 9 日那天的學生大會討論罷課的事，胡適和傅斯年都登台發言，受到左翼學生噓聲干擾，胡適當場予以斥責，而得到大多數學生鼓掌支持，使得左翼學生策動罷課的企圖失敗。⁵⁸

由於一二九運動的請願書未能面遞，又有不少同學受傷或被拘，加上 13 日南京政府發表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消息，學生疑為冀東自治的變相，遂決定發動更大規模的一二一六示威遊行。結果果然轟轟烈烈，軍警以水龍、刀背、皮帶伺候，學生受重傷者 75 人，輕傷者 297 人，被捕者 8 人，失蹤者 25 人。⁵⁹事後《獨立評論》收到了許多關於北平學運的文章，胡適挑了三篇發表，大致都是從學生的角度對活動所做的描述和評論，胡適自己也寫了〈再論學生運動〉，批評何應欽（1890-1987）部長不應該迴避接見學生，批評軍警用武器追打已被衝散的學生是「不可恕的野蠻行為」，但是他同時

⁵⁵ 這篇宣言在 1935 年 11 月 24 日發表，《國聞週報》於 12 月 2 日刊出。收入李雲漢編，前揭書，頁 654-655。

⁵⁶ 梁敬鋒，前揭書，頁 124。

⁵⁷ 胡適，〈為學生運動進一言〉，《獨立評論》第 182 號（1935 年 12 月 22 日），頁 4-7。

⁵⁸ 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四冊，頁 1439。

⁵⁹ 梁敬鋒，前揭書，頁 123-124。

向學生建議「即日復課」，希望他們請求學校當局取消本學年的寒假，以供補課及考試之用。⁶⁰

這樣理性平和的政論，安撫學潮的作用則或有之，怎可能發揮什麼「操縱學潮」的作用？

討論與結語

《獨立評論》出版滿四週年的時候，全國已經有 13,000 個讀者，相對於三週年的 7,000 個讀者，成長可謂迅速。陶希聖（1898-1988）在四週年特刊上說，他曾在江南聽見朋友敘述：「這一帶很有些人喜歡獨立評論，最大的原因是它不唱高調。」⁶¹胡適自己的解釋則是：調子沒有什麼高低可說，可說的是「是不是用我們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結果？」是不是無所苟、負責任的政論？這種敬慎的態度當然不能叫人麻醉、不能叫人過癮，「但我們深信，這種態度是我們應該提倡的，至少是我們應該時時督責我們自己嚴格實行的。」⁶²其實，先一年陶希聖即曾寫信給胡適，說「自責」在學術界是應當的，但在（對社會的——筆者按）教育上則又不應當自責而應當自吹，這是一個兩面標準（double standard）。胡適的回答是不能接受，他說他何嘗不想「民族抬頭」？但他不認為違心的「教育」手段能使這個民族抬頭，他深信救國之法在於深自譴責、懺悔、愧恥，才能夠湔除舊污、創造新國，而且「請你注意我們提倡自責的人並非不愛國，也並非反民族主義者，我們只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者而已。」⁶³

《獨立評論》的主要撰稿人大多是學有專長的知識份子，或許是經常聚談的關係，除了在開放政權、統一方式的問題上有民主論（胡適、張熙若）、獨裁論（蔣廷黻、丁文江）、折衷論（陳之邁、張佛泉、蕭公權）的差別，

⁶⁰ 胡適，〈再論學生運動〉，《獨立評論》第 183 號（1935 年 12 月 29 日），頁 2-4。

⁶¹ 陶希聖，〈低調與高調〉，《獨立評論》第 201 號（1936 年 5 月 17 日），頁 48-49。

⁶² 胡適，〈獨立評論的四週年〉，同上註，頁 3-5。

⁶³ 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四冊，頁 1379-1380。

⁶⁴對於抗日問題的看法則有相當的共識。⁶⁵當時他們都知道中國與日本的軍力對比，因而不主張對日宣戰，尤其不「昧著良心主張作戰」；但是他們反對苟安式的妥協，主張在抵抗中求妥協，同時利用一切國際關係來牽制日本，使它有與中國妥協的可能；他們在東北問題上毫不讓步、絕不能承認偽滿洲國，但不是要唱「收復失土」的高調，而是指「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他們在民族主義的心情下，譴責「閩變」、譴責「兩廣異動」、安撫學生運動，要求各方團結一致擁護南京政府。

《獨立評論》的同仁不但隨著政局起伏撰寫政論，並且以實際行動介入政治。例如 1933 年 3 月 3 日當熱河危急的時候，丁文江、翁文灝和胡適三人會商，即擬了一個電報，用密碼打給蔣委員長：「熱河危急，決非漢卿（張學良）所能支持。不戰再失一省，對內對外，中央必難逃責。非公即日飛來指揮挽救，政府將無以自解於天下。」次日翁文灝即得到蔣先生覆電說將在 3 月 5 日北上。不過蔣未北上即已「熱河全省陷落」了。3 月 10 日晚上張學良約了丁文江、蔣夢麟、梅貽琦、胡適去談話，張說他已見蔣，蔣要他辭職，他已辭了，特邀幾位來告別；3 月 13 日，丁、翁、胡三人又同到保定去看蔣介石。⁶⁶1936 年西安事變發生以後，胡適剛從海外回來，立刻寫了〈張學良的叛國〉一文，譴責張的舉動是背叛國家、破壞統一、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胡適說在那幾天之中他「見著了至少兩三百個來客」，有老有少，有平日愛護蔣的也有時常批評蔣的，大家丟開政見的異同，同聲關切蔣的安全，這是「最近兩三年堅忍苦幹的事實逐漸得國人明瞭認識的自然效果」，基本上胡適認為國民政府五年的忍辱不戰「所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整齊的步伐、充實的力量」，所以他以少有的嚴厲口吻批評共產黨高唱的民族主義戰線是無恥的欺騙，「因為決沒有真正抗日的人們願意劫持危害那主

⁶⁴ 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第三章，頁 59-151。

⁶⁵ 這是比較而言。胡適並不諱言同仁之間也有不同意見，但他們逐漸習慣這種「各人自己負責任的辦法」。參見胡適，〈又大一歲了〉，《獨立評論》第 151 號（1935 年 5 月 19 日），頁 2-4。

⁶⁶ 這一段「忙碌」的經過，見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47-148。

持國防建設並且正開始抗敵戰爭的最高領袖的」。胡適這篇文章除了發表在《大公報》、《國聞週刊》以外，還與傅斯年的〈論張賊之叛變〉一文，同被南京當局印成傳單，用飛機投擲西安城內。⁶⁷

胡適就在這幾年的國難時期開始與蔣介石論交，⁶⁸蔣廷黻、翁文灝甚至進入南京政府做官。不過《獨立評論》並沒有喪失獨立的立場，第 81 號、91 號被南京的郵電檢查員扣留；廣東當局也因讀經問題和槍決瘋病人的問題受到批評，至少兩度禁止《獨立評論》入境；最嚴重的一次是刊登張熙若的〈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一文，遭宋哲元下令停刊四個多月，經過斡旋才得以復刊。⁶⁹

綜上所述，1930 年代這一群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民族主義言行，可否直接稱為「自由民族主義」？若依前引 Yael Tamir 的提法，探討自由民族主義只是要尋求那兩套價值互相妥協、互相容納的可能，或是否「把國族思考放在自由主義的界線內」，⁷⁰那麼我們不妨作以下的摘要對照：

* 不犧牲別的價值來終極地追求另一套價值

反對榨錢拉佚，反對鎮壓學生運動，國難時期仍應維護批評政府的自由。

* 「反省、選擇」和「歷史、命運」同樣重要

中國落後乃因政治不上軌道，不應歸咎於帝國主義；要懺悔並積極改革。反對武力統一，主張開放憲政、還政於民（這部份有蔣廷黻、丁文江的例外）。

⁶⁷ 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四冊，頁 1547-1551。當時中共對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扮演一定的角色，曲折的過程應非當時的胡適所能瞭解：由於蘇聯或第三國際明白不支持劫蔣，加上國內的民族主義氣氛，都是中共必須支持放蔣的原因。詳見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年）。

⁶⁸ 兩人關係詳見陳儀深，〈胡適與蔣介石〉，收入周策縱等合著，《胡適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 年），頁 97-112。從 1932 年迄 1935 年，胡適與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有十數次的書信往返，其間大多涉及職務的邀請和拒絕，包括教育部長、駐美大使等：胡適是在抗戰爆發後的 1938 年 7 月才接受徵調出任駐美大使。

⁶⁹ 詳見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頁 10-11。

⁷⁰ Yael Tamir, *op.cit.*, p.11.

* 理性與感性的平衡

中日國力懸殊，應尋求國際調停，不放棄和平解決的希望；勿奢言收復東北，亦勿輕言開戰，但須即作有計畫的準備，在未失的疆土上力求抵抗。

* 就事論事不藉題發揮

對於一些地方勢力與共產黨動輒把「抗日」、「反蔣」掛勾，做出親痛仇快的舉動，《獨立評論》予以譴責；但對於政府的缺失仍予批評，甚至因而遭到停刊。

雖說面對外敵侵略的時候，可能人人都是民族主義者，但就深受自由主義影響的《獨立評論》同仁而言，固然與徐炳昶、董時進的暴虎馮河不同，與發起學生運動進而策動罷課的人不同，與感情用事的張學良不同，亦與遲遲不肯開放憲政的政府中人不同，⁷¹究其不同的原因可能不只一端，但顯然與自由主義的範限有關。這就是「把國族思考放在自由主義的界線內」吧。

筆者在多年以前研究《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曾就民主思想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作一論斷：「只有不負責任的在野者，才會假藉自由、民主、人權的招牌來做危害國家的行動；只有『別具用心』的當政者，才會假藉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幌子來剝奪人民應有的權利。對一個平實的自由主義者而言，民族主義與自由民主似乎沒有一般想像的那樣互相衝突。」⁷²如今考察《獨立評論》對中日關係問題的處理，可以進一步肯定其民族主義立場，是熱情中帶著理性、堅持中包含妥協，應可稱作是一種「自由民族主義」的表現。

⁷¹ 南京政府在中共等反對勢力的宣傳下，頗有不抗日、姑息、甚至親日的形象，除了有胡適在西安事變後的反駁，亦有學者研究認為南京政府的真正意圖是漸進主義（gradualism）而不是姑息妥協，後因民間日增的壓力與中蘇秘密外交等因素，才轉為反擊對抗。參見 Youli Sun, *China and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3), pp.41-62. 但南京政府施行訓政即一黨專政，則是共知的常識。

⁷² 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頁 258-259。

徵引書目

一、基本史料

1. 丁文江，〈日本的財政〉，《獨立評論》第 2 號，1932 年 5 月 29 日。
2. 丁文江，〈日本的新內閣〉，《獨立評論》第 2 號，1932 年 5 月 29 日。
3. 丁文江，〈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的前途〉，《獨立評論》第 1 號，1932 年 5 月 22 日。
4. 丁文江，〈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獨立評論》第 37 號，1933 年 2 月 12 日。
5. 丁文江，〈假如我是張學良〉，《獨立評論》第 13 號，1932 年 8 月 14 日。
6. 丁文江，〈假如我是蔣介石〉，《獨立評論》第 35 號，1933 年 1 月 15 日。
7. 田伯烈 (H. J. Timperley)，〈「滿洲國」視察記〉，《獨立評論》第 121 號，1934 年 10 月 7 日。
8. 室伏高信，〈胡適再見記〉，收入胡頌平編著，前揭書。
9. 室伏高信，〈答胡適之書〉，《獨立評論》第 180 號，1935 年 12 月 8 日。
10. 胡適，〈又大一歲了〉，《獨立評論》第 151 號，1935 年 5 月 19 日。
11. 胡適，〈中華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第五十九軍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收入李雲漢編，前揭書。
12. 胡適，〈全國震驚以後〉，《獨立評論》第 41 號，1933 年 3 月 12 日。
13. 胡適，〈再論學生運動〉，《獨立評論》第 183 號，1935 年 12 月 29 日。
14. 胡適，〈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獨立評論》第 46 號，1933 年 4 月 16 日。
15. 胡適，〈建國問題引論〉，《獨立評論》第 77 號，1933 年 11 月 19 日。
16. 胡適，〈為學生運動進一言〉，《獨立評論》第 182 號，1935 年 12 月 22 日。
17. 胡適，〈國聯還可以抬頭〉，《獨立評論》第 202 號，1936 年 5 月 24 日。
18. 胡適，〈答室伏高信先生〉，《獨立評論》第 180 號，1935 年 12 月 8 日。
19. 胡適，〈華北問題〉，《獨立評論》第 179 號，1935 年 11 月 8 日。

20. 胡適，〈敬告日本國民〉，《獨立評論》第 178 號，1935 年 11 月 24 日。
21. 胡適，〈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獨立評論》第 197 號，1936 年 4 月 19 日。
22. 胡適，〈獨立評論的四週年〉，《獨立評論》第 201 號，1936 年 5 月 17 日。
23. 徐炳昶，〈西安通訊〉，《獨立評論》第 46 號，1933 年 4 月 16 日。
24. 翁文灝，〈一個日本的人才統計〉，《獨立評論》第 73 號，1933 年 10 月 22 日。
25. 翁文灝，〈我們還有別的路麼〉，《獨立評論》第 47 號，1933 年 4 月 23 日。
26. 張忠綏，〈國聯的沒落〉，《獨立評論》第 201 號，1936 年 5 月 17 日。
27. 陳運煌，〈冒險過偽國記〉，《獨立評論》第 84 號，1934 年 1 月 7 日。
28. 傅斯年，〈「不懂得日本的情形」！？〉，《獨立評論》第 88 號，1934 年 2 月 4 日。
29. 傅斯年，〈「中日親善」！？〉，《獨立評論》第 140 號，1935 年 3 月 3 日。
30. 傅斯年，〈中華民族是整個的〉，《獨立評論》第 181 號，1935 年 12 月 15 日。
31. 傅斯年，〈日寇與熱河平津〉，《獨立評論》第 13 號，1932 年 8 月 14 日。
32. 傅斯年，〈北方人民與國難〉，《獨立評論》第 181 號，1935 年 12 月 15 日。
33. 傅斯年，〈國聯態度轉變之推測〉，《獨立評論》第 39 號，1933 年 2 月 26 日。
34. 蔣廷黻，〈外交與輿論〉，《獨立評論》第 70 號，1933 年 10 月 1 日。
35. 蔣廷黻，〈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獨立評論》第 47 號，1933 年 4 月 23 日。
36. 蔣廷黻，〈東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約〉，《獨立評論》第 8 號，1932 年 7 月 10 日。
37. 蔣廷黻，〈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與國際〉，《獨立評論》第 45 號，1933 年 4 月 9 日。

38. 蔣廷黻，〈帝國主義與常識〉，《獨立評論》第 71 號，1933 年 10 月 8 日。
39. 蔣廷黻，〈國際現勢的分析〉，《獨立評論》第 88 號，1934 年 2 月 4 日。
40. 蕭公權，〈中央外交方針如何轉變？〉，《獨立評論》第 66 號，1933 年 9 月 3 日。
41. 羅隆基，〈「國聯還可以抬頭」？〉，《獨立評論》第 204 號，1936 年 6 月 7 日。

二、專書

1.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公司，1998 年。
2. 李松林等編，《中國國民黨大事記（1894.11~1986.12）》，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年。
3. 李雲漢編，《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台北：正中書局，1982 年。
4.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四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年。
5.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年。
6. 梁敬鉉，《日本侵略華北史述》，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 年。
7. 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 年。
8.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年。
9. Watkins, Frederick 著，李豐斌譯，《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 年。
10. Christenson, Reo M. et al., *Ideologies and Modern Politics*. 3r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1.
11. Sun, Youli, *China and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3.
12. Tamir, Yael,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三、論文

1. 吳乃德，〈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台灣政治學會，《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1996年7月。
2. 張忠棟，〈胡適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收入《政治批評與知識份子》，台北：自立晚報社，1985年。
3. 陳儀深，〈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收入《「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6月。
4. 陳儀深，〈胡適與蔣介石〉，收入周策縱等合著，《胡適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
5. 趙剛，〈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1期，1996年1月。
6. 墨子刻，〈再論政治批評的風格——答張忠棟、康勤、廖仁義諸先生〉，中國時報副刊，1983年5月20-23日。

